

香港傳真

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08-80

2008年11月6日

赤軍的女兒

張承志

那是在 90 年代最初，或者就是 1991 年？PKO，PKO，反正那時候，日本正要通過向海外派兵的法案——

我到一個大學去。

進了校門，看見大群的學生，戴著口罩和安全帽，手持木棒小跑著，踩著腳組成一個圓陣，齊聲地喊著口號。兩面旗幟在他們簇擁之中，一面寫著“憲法保衛”，另一面寫著“安保粉碎”。

我和一個學生攀談起來。於是知道，他們是為了反對向海外派兵、反對日本政府復活軍國主義，去進行示威遊行。

他問我的態度。

我心裡一陣激動。我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：“我不單支持你們，我真想和你們一塊去！……”

今天去哪兒？那學生突然低聲：

“去防衛廳！今天，打算和他們直接幹！……”

——聽見這個“幹”字時，我心中一動。仿佛一種緊張與同夥的悸動，從心頭掠過。

時間到了。不是他們出發的時間，是我和教授們約會的時間到了。我戀戀不捨，離開他們，朝樓裡走去。

我捉摸著自己的腳步。那一刻的感覺實在古怪。似乎我在逃跑；把自己的戰線，推給了這些日本的年輕人。

(一)

日本民族付出了三百萬條生命，換來了今日的日子。

進步的日本人把這種生活喚做小康，而把這種狀態視為和平。

他們不能容忍政府再一次把國家的臉上塗上任何的戰爭色、哪怕以“國際貢獻”的堂皇名義。他們對戰爭有敏感的識別，知道美國佬到處掀起的戰爭，不僅與明治以來的50年戰禍一脈相連，而且與日本的噩夢、即軍國法西斯的統治前因後果。這就是捍衛承諾放棄戰爭權的憲法、反對“日美安全保障條約”的、20世紀70年代群眾運動和學生運動的出發點。

這一運動波濤洶湧，幾度高潮，屢次曲折。這一運動驚心動魄，也許該說它可歌可泣。

它首先是支援中國和粉碎反華包圍的一種進步運動。所以就本質而言，它是對養育了日本文化的中國的一種良心回報。同樣作為良心的回報，中國人不該對他們的鬥爭不知不曉、麻木不仁、不聞不問。

我並不是一個合適的介紹人。只是由於一種感動，它使我不能平靜，不能旁觀，催我站起發言。

我該從哪裡出發、我該怎樣描繪——我能夠評價那個時代以及那大時代裡人的群像嗎？

光陰飛逝，時至如今，回顧安保鬥爭、全學連、全共鬥、三里塚、水俣病等一場場波瀾壯闊的鬥爭，以及白土漫畫、問題電影、民謠游擊隊、70年代層出不窮的新音樂，還有炸彈攻擊、飛機劫持、內部武鬥、遠走中東——已經幾近不能了。

事件漫漶著事件，時間反復地淘漉。所有的事情都有那麼多頭緒，任何的一件都糾纏盤結——自1983年我第一次滯留日本就滿懷熱情接近它們，直到我兩鬢飛白蹉跎半生，最後也沒能弄清一切。

然而我獲得了寶貴的感覺。我摸到了一個躲閃的脈搏。當我的指尖觸碰到那跳動，當我雖然還沒弄清所有過程但已感到了其中的忘我、熱情、瘋狂、殉命、都是為了阻止軍國主義復活、為了守護和平憲法和反對日美軍事結盟，換句話說，是從對中國的支援和愛意開始的——我便無法平靜。

查找系統的資料，是件很麻煩的事。雖然我想給這隨意的筆記堆砌權威的數據，但最終我還是決定：過分專業的事不必由我來做，我還是只俯拾熟悉的片斷，只求抒發的自由。

我只想了卻這筆夙願。

如果把那個時代叫做60年代安保時代，一脈潮流就再也沒有中斷過。一系列響亮的話語被創造出來、或者從中國法國引進：“與其在戰爭中死，不如在反戰中死”、“生於戀愛與革命”、“堅守自我的第一步”……

1967年有羽田、佐世保、王子的鬥爭。68年國際反戰日，數萬人在新宿舉行抗議。年底至69年東京大學爆發了著名的安田講堂保衛戰，昔日的帝國大學樓上高懸著“造反有理”的鉅幅標語。上萬名警察進入校園、天上直昇飛機噴灑催淚劑。在火焰的光影中，學生的嘶啞聲音，一直廣播到最後一刻。在那個時代，教育制度遭到了顛覆的質疑，對學問存在方式的批判，至今顯示著先驅的意義。思想的衝擊甚至突入了媒體——這新興的體制，並且刺激了它的變化。……

就像學生們編輯的資料集宣言的：以“過去時”談論學生鬥爭的人，只是暴露了自己保守的內面。

與左翼學生運動如怒濤席捲日本的同時，幾個撼動全社會和地域的大事件逐一引發。70年代安保鬥爭的核心三里塚、沖繩、水俣，都不僅震撼著日本的體制，也深深觸及了日本人的內心。

三里塚反抗機場毀滅農村的鬥爭，原來是從守衛土地和生活的基點出發的。在抗爭的過程中它不斷獲得意義的提昇，後來變成一種安保鬥爭的農民解放陣線。他們進行的，已經可說是前所未有的農民起義：舉目茫茫，無數的農民、學生和左翼市民，28000餘人投入了與警察的大決戰。他們建築堡壘，遍挖戰壕，把身體縛在木架子上，寸土不讓，堅持數年。

沖繩鬥爭則一拳同時打向美日。運動爆發時沖繩在美軍佔領之下，尚未歸還日本。因為美軍車軋死了一名市民，惹起沖繩人與美軍憲兵的對峙，最終蔓延成暴動，一次73輛美軍軍車被燒。1971年日美沖繩條約簽字時，一次就有92000人參加了抗議遊行，其中837人被捕。沖繩本是日本在近代的擴張中以武力強佔的琉球國、又是二次大戰末期日本國內唯一與美軍發生陸戰的地方。日軍曾強迫沖繩民衆自殺或動手屠殺平民，使沖繩人死亡了20萬人。沖繩與日本怨深緣淺。沖繩的抗議，帶有直接對抗美國佔領軍、抗議為天皇殉死、以及清算殖民主義的多重含義。

水俣（みなまた），這個詞，我是去年在京都，從著名的教授谷川道雄那兒聽來的。他對我說：

你難道沒聽說過水俣病麼？我兒時就生長在那裡。那個叫水俣（みなまた）的村子，就在長崎附近的熊本。因為工業污染，也有人說是因為美軍拋棄在那裡的廢彈，我的家鄉發生了一種病，是可怕的污染造成的怪病。魚變得吃魚，貓病了跳井，女人懷了身孕，生下來畸形兒。……

我這才知道了：水俣病是世界上最大的水銀公害病。有機水銀經化學工廠排入河川海洋，被魚蝦貝蚶吞噬吸收。常食魚貝的居民又將其攝入、從而引起的中毒性神經疾患，叫做水俣病。人患了此病，大腦中樞神經被破壞、內臟也被污染。胎兒在母腹中被感染，患者在短期內痛苦絕叫而死。總之，這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現代病。

到了1970年以後，全共鬥運動已經退潮。但在個別大學，如東大教養學部卻一連召開以“鬥爭與學問”為主題的討論會；追究在三里塚、公害、殘疾人問題中的“學問與大學的作用”。1976年，他們深入水俣病地區，調查新發生的、染病孩童的歧視問題。他們組織“智障兒重返普通學校全國聯絡會”，推動社會的救援。

反對越南戰爭的抗議運動，是那個大時代的導火索和主戰場。抗美援朝運動，是全世界整整一代人的啟蒙導師。

1980年秋，在東京街頭，我第一次看見了抗美援朝的日本學生。

那不僅是我第一次到日本，也是第一次走出國門。為我展開的世界，送給我的一個印象是他們。如今回憶著心懷感激。我們幾個人，在那夥學生的前面站住了，久久聽一位女學生的慷慨演講。她給了我一種強烈的印象。那面龐的姣好，與人身處的正義，合成了一種讓人感服的美感。

那一次我們和他們交談起來。我知道了他們是在為被美軍侵略的越南募捐，他們介紹了募捐來的錢怎樣送到越南，那一環環的途徑。

我有些害臊地說：

看我們中國人！沒有人像你們一樣在街頭募捐……

他們回答：不，中國的貢獻非常大。因為全世界人民募款和捐獻的總和，只佔總數的三分之一。還有三分之一是來自蘇聯。中國一個國家對越南的援助，也佔世界援越的三分之一！……

我聽了又挺自豪。

世事變幻，我總是回想起那街頭的一幕。或許我們還是缺了一課。雖然我們也揮舞過紅旗、高呼過援越抗美的口號，雖然我

們也組成了大時代的一環——但我們缺乏在體制之外的、只憑個性和思想的、援救他人的經歷。

時代的全貌，在後來才徐徐展開。到如今，我們懂得了60年代反戰運動的價值。一種逝去的精神，令我嚮往。也許一切只是時代的流行。那時流行的是：看不得他人的苦難。

年輕人、好人、進步的人都宛似同盟，全球每個角落都同仇敵愾發動對越南戰爭的抗議，還有整個世界都呼籲對巴勒斯坦人民生存權的援助——那一切，都在那個時代流行和灼烤，使得人的激情點燃，嘲笑體制拒絕庸俗——如今看來，那一切，都是千金難買的財富。

(二)

提起樺美智子這個名字，50歲以上的日本人，表情會變得嚴肅起來。因為這個女孩的名字，標誌著一個偉大時代的開篇。接著上文的話說，她標誌著一個捍衛和平憲法九條、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、所謂“安保鬥爭”的漫長時代——已經開幕。

她是那大時代撞擊中、是日本人為保衛和平犧牲的第一條生命。

1960年6月15日，日本學生、工會、演劇界的各種組織聚集在國會議事堂，發動反安保大遊行。

到了傍晚，現場發生了激變。

日本政府為挽回失控的局勢，委託日本各右翼團夥介入政局。換句話就是，調動右翼流氓對左派學生實行暴力。於是，日本的右翼活動家兒玉譽士夫（曾作為甲級戰犯被起訴，後釋放）組織了稻川組、松葉會、神農愛國同志會等右翼組織兩萬餘人，號稱“維新行動隊”，突入遊行隊伍，在國會周邊對遊行的學生市民大打出手，尤其對婦女眾多的演劇界遊行隊，極盡流氓暴行。

警察從來是權勢的走狗、右派的盟友。

最初叫做機動隊的防暴警察，圍在一邊看熱鬧，縱容右翼的野蠻行徑。他們在等待更殘酷的出手。

約有八千人的學生群，聽聞了右翼暴行憤怒至極，他們開始衝擊國會。警察使用兩臺噴水車與學生攻防糾纏，學生兩度衝入國會，佔領了國會內院，在那裡集會抗議。

夜十時，就如世界上許多地方演出的醜劇一樣，警察開始動武了。

防暴隊用警棍殘酷毒打，學生們被逐出了國會。加之下雨和負傷，學生被大量逮捕。但學生們仍然堅持著對國會的包圍。16日拂曉，警察開始使用催淚彈驅逐學生。

樺美智子是東京大學日本史學科的學生。當夜在警察對學生的武力襲擊中，在國會南通用門，被日本警察殺害，時年僅22歲。一種傳聞散佈她被催淚彈擊中致死的輿論，其實不然。應父母要求醫生所做的解剖結論是：“因脖頸被強力勒緊，眼睛嚴重淤血。因遭到踐踏，內臟嚴重出血”——明白揭露了警察殺害一個女學生的野蠻行為。

除了樺美智子死亡之外，那一夜的重傷者達43人、負傷者有589人之多，此外尚有182人被捕。

——只要願意，這一切資料從日本的網頁上很容易讀到。比蒼白的敘述更逼真的是照片；一張從頭頂上方俯拍的照片，引人如入其境：密密麻麻的人頭擠滿了畫面，一半是閃亮的警察頭盔，一半是市民學生。人浪密不透風，推、撞、嘶吼、扭打在一方狹窄的空間。

“九條”，“安保”，日本在最激烈地抗爭與分裂。

明治以來愚忠愚信的國民之外，一種新型的日本國民，在那時迅速地成熟了。他們不是為日本國，而是為他人的和平、為流血的越南和革命的中國，歡呼與抗爭，悲喜與獻身。

擁堵和激烈的畫面，讓人不斷地遐想著日本人。在那個島國，那些不善辭語的人，只為了一句和平的承諾、只為了反對勾結美

國、只為了援助中國越南、只為了一種良心……就動了真的。
後來讀到了更多的回憶。有一則這樣寫道：

夜 7 點過後，衝進了南門的我們，看見對面是黑壓壓不知數的警察，還有國會高樓的影子。我們朝著那一群前進。警察也朝這邊走來。

恐怖的一瞬。……

腳下是泥的海。警棍像劈柴一樣砸在學生的頭上肩上。這裡那裡，都有學生血污滿頭地倒下。旁邊的女生滑了一下。還有幾個學生摔倒。逃走的女生背後，警棍追著再打，倒下的女生身上，便衣用雨傘尖戳著。倒下的學生的身上，又被泥靴子踐踏而過。血泥塗滿的學生被便衣扣上手銬，拉扯到院子裡的樹下。……

不知誰在喊：這個女的死了！……

不許日本再走戰爭路 — 這一信念，曾被一個女生拼了性命守護。無論到了什麼時候，這樣一個事實，都重重墜在我心上。樺美智子的以死傾訴，我們認真應答了麼？每當巡迴到了 6.15，我就不禁這樣自問。……

樺美智子留下了一份遺稿。

不同於詩人的作偽，這不過是一個女學生的一些悄悄話。其中有一首詩，在樺美智子死後，曾經被廣泛地朗誦和引用。詩的題目叫做《最後》。

作為一名職業作家，半生裡我不知接觸過多少詩人和詩。當要表態評價時，面對刻意或華麗的句子，我常木訥，不知措辭。包括對出色的作品；我常在讚譽之前，古怪地覺察到隔膜。何況作品背後的人；詩人大都靠著兩句喏一世，暴露著一種人與詩的不均衡。而樺美智子的這一首不同：她的詩素樸得幾乎不是詩，但卻令我揣摩吟味，感到信任。

我想引用它，但我譯不出那獨語的孤寂。有幾句是這樣的：

雖然我

大概永遠也不去笑
可能根本就不會笑
也挺好
—— 只是，若是能，在最後我想
不為人知地
悄悄地微笑

(三)

今日若想評價那個時代，不能不重新檢視著名的日本憲法第九條。

日本國憲法第二章〔戰爭之放棄、戰力及交戰權之否認〕第九條

1，日本國民誠實希求以正義與秩序為基調之國際和平，對作為國際爭端解決手段的國家主權之戰爭發動、武力威嚇或武力行使，永久對之放棄。

2，為達前項之目的，對陸海空軍及其他之戰力不予保持；對國家之交戰權不予承認。

有兩個詞：一個是“戰力”（戰力），指的是軍事力量。近來中國流行日語單詞，電視臺滿嘴都是“人氣”、“寫真”、“人間蒸發”——兼之警力一語正在進入國語；所以可以把軍事力量、戰爭能力等詞譯為“戰力”。

但更重要的是另一個日文當用漢字詞彙：“國權”（國權）。只是由於這個詞，我才把這一條進行了再翻譯。

英文是 a sovereign right of the nation，含義不僅是國家“權利”或國家“權力”，而是國家“主權”。

“國權”既是“國家主權”，就意味著：憲法九條表達了一種非常規的思想。因為在邏輯和實踐上，它宣佈著放棄一項國家主權。

因這第九條，日本憲法在世界享有鉅大的榮譽。一切進步的人士都認為：它宣誓不戰、建立不戰的國家模式，是一部具有先驅性的憲法。它是未來世界的橋樑，是和平主義的原理。

由於第二章即第九條的存在，這部憲法在 60 多年裡，以嚴厲的違憲否決，限制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。它勒著日本拼命向右扭的馬頭，給反省戰爭罪行的、希望成為亞洲一員的、反對敵視中國反對給美國當幫兇的、珍惜和平的日本民衆以強大的支撐。

另一方面，自近代以來，日本作為一個國家，高瞻遠矚，自豪優越，果斷無情。它具有悠久的鄙亞慕歐、聯強伐弱、取代中華、稱霸東方的思想。這一思想曾經引導它不斷地飛躍和勝利。雖然在最後遭逢了慘敗，但它的崛起史，總的說是一部民族主義的勝利史。憲法九條的存在，永遠都是對如此民族主義的警告和限制，它約束了國民心理中的大國狂熱，誘導國民在高尚的層次建立民族心和國際精神。

但是，150 年以來，一個國家的強烈的運動趨勢，不會因為兩顆原子彈一場失敗而煙消雲散——所以日本在戰後作為一個國家的步伐，依然是新車舊道，結盟列強、排斥中國，循著脫亞制亞的古老熱望。

這執著了 150 年的心情，一定要突破憲法九條——這條緊緊束縛著政客、以及舊軍國信徒的捆妖繩。

日本的走馬燈政壇，已走過幾代的政客。他們鏗而不捨，以靖國神社試探、以國際貢獻造勢、一步步走向廢棄九條還原國權、拒絕一國允諾和平的目標。

左翼思想的全球退潮、對中國崛起的警惕和不信，一百多年的狹隘民族主義、都助長著日本政客的運作。

我一邊寫一邊想：也許，我的稿子還來不及出版；甚至該怎麼翻譯憲法九條的用字還在推敲，海那邊，右派的政客就已得逞、九條被刪除、著名的和平憲法在一朝被推翻！……

難道不可能麼？不，就數這種可能性最大。剛剛讀到的最新一期岩波《世界》雜誌上有一則資料，據 2005 年的民意調查，僅僅民主黨的支持者就有 67% 支持修改憲法，49% 贊成改正九條。

——這樣的與時間比賽的想像，是悲哀的：這一邊，連我一支自律的筆尚被百般刁難，那一邊，向右傾斜的馬頭卻被再三加鞭；也許，在這令人怒而無語、悲而無淚的卑鄙世界的運行中，衛護和平的人牆就要坍塌、約束和平的契約就要撕碎了！

2006 年的 6 月 15 日，離我寫著這部稿子的此刻宛如昨日，原全學連的一群“同志”又來到日本國會，實行阻止改憲的示威行進。

熟悉的一群，在雨中聚集東京。

我的心怦怦跳著，我的肩頭也淋著那冬雨。樺美智子死後已是第 46、第 48……已是半個世紀。他們原來並沒有離散……我凝視著，心中驚奇。他們的花白的頭髮，不是生理的標誌，而是青春不老的一代的標誌……在北京的暗夜，我如站在他們之中，感覺著一種資格的尊嚴。他們都不在意 60 歲的年齡，密佈額頭的皺紋。我也一樣，靈魂是不知衰老的。一代人的奮鬥，已揭開了最後一頁，在雨中的東京，高舉的標語上寫著：

“阻止對九條的改憲！不許埋葬和平主義！”

我擠上前去，抓過一份傳單。他們的講演詞，開頭是這麼寫的：

一個叫做全球化的、資本的妖怪，正在地球上徘徊。它突破了民族、宗教、文化的牆壁，使資本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席捲世界。它是弱肉強食的同義語，造成了廣泛的貧富差別、失業、貧困……

感動的時候，人就陷入夢遊和冥想。一瞬間我又換了場所，正和自己的讀者圍成一圈。

古人教誨我們：知是為了行，知與行如一。不知我們中國人在富裕了以後，能不能為了世上那些無助的人、那些被殺戮的人、

飢餓的人、被侵略、掠奪和凌辱的人，也這樣呼喊，也這樣想和這樣做。在不是自己必需、而是他人缺少的時候、在大規模殺傷性媒體的密集炮火攔截的時候、在侏儒和小市民的庸俗哲學重重包圍四面嘲笑的時候——也這樣走上街頭，也這樣義不惜身。

(四)

以“安田砦”（東京大學安田講堂）被警察攻陷為分界線，後來的日本學生運動進入了低潮。

學生們戴著墨鏡，拒絕上課，在“四疊半”的小屋戀人同居，哼著風靡那個年代的流行歌：《去結婚吧》和《神田川》。他們冷眼瞞著世間，各投其路，緬懷著過去，退出了舞臺。

可是一些不服輸的人，沒有退出。

從學校坍塌的街壘，有一夥人一步就邁進了城市游擊戰，身份也驟然從學生變成了游擊隊員。炸彈攻擊、襲擊警察、毫無戲言的“戰爭”，突然取代了昨天半像節日的遊行。

他們派別複雜，彼此莫名內訌。病毒般蔓延的，是分裂與殘酷。他們漸漸地脫離了朋友、陣營和民衆。他們用自製和奪來的炸彈，在日本實施了大約數十次、三百餘枚炸彈攻擊。一時間日本四處狼煙，人心惶惶。在一個短暫但複雜的過程之後，左翼過激派的兩支決定配合作戰，史稱連合赤軍。

他們的想法和行為，主要向兩個方向分流。

其中的一支，在山嶽潛伏中，在滅頂的壓力和精神崩潰中，居然以思想整肅的名義，殺害了十數名戰友——罪孽的小隊走投無路，最後籠城於淺間山的旅館，主要用獵槍（有一支手槍）與警察對射一場，最後銀鐺入獄。

殘害同伴的事實隨之暴露。如此的罪孽一旦公之天下，日本全國、包括所有的左翼學生都不能容忍了！極左派的名聲，一墜千丈。

時至今日我仍覺得，他們的行為不可理喻。他們做過的事，彼此是撕裂和對立的。援救貧弱的好意和極度變態的殘忍，居然能孿生於一身！……

對革命的陰暗面，中國人並不生疏。但是，即便飽讀和熟聽紅色之醜革命之惡的中國人，仍然會感到滿心震驚：日本的極左派居然幹出了——以毆打致死來對付同伴戰友的整風！

——這個詞，日文寫作“總括”，該怎麼翻譯它呢？總結？！整風？！

20年裡，每當讀到它的資料，我都聽見自己怦怦的心跳。我無力，也無心敘述這一部分。1992年在日本名古屋，我讀著阪口宏的《淺間山莊》，心情痛苦無比。

後來一批赤軍劫持了飛機，要求政府釋放獄中戰友。當日本政府決定答允劫機者的時候，死刑囚阪口宏拒絕出獄。

因為這是一次他本人對自己的判刑，除此他不能解脫。唯有對自己處以極刑，才能抵銷心頭的重罪。

其實並非是政府、法律、資本主義的世界體制、以及敵對的思潮打敗了他們。打敗、否定和拋棄了他們的，正是共產主義思想的初衷——左翼運動的人道主義起點。

在深山裡，十數名同伴被活活打死——這件事使得整個抗議運動都安靜了，使整個對軍國主義的批判都沉默了。

難言的挫折感，陪伴著他們，也陪伴著我們。

一切都與我們有關。無論國籍怎樣相異，中國革命是他們最初的教師。讀著時心裡如刀鋒鋸割，這是自己內裡的愛恨交鋒——它們撕咬不休、血流不止、使心成了一片血污泥濘！

即便掉頭遠走，也未必能獲輕鬆。難道隨著人說：紅黨天生性惡，本質就是法西斯，基因使它逃不脫內訌、孤立、權力慾、恐懼和變態！？……去讀日本的反思吧——有人分析：赤軍的極端和暴力，源於日本的法西斯時代。

我啞然無語。

但是歷史過程並非只是變態殺人。也不必急於做法西斯遺傳的體檢。在解剖最終在淺間山莊覆滅的那支罪過的小隊時，也應該還有勇氣、還有餘墨，檢討他們的全貌。

——冒死盜走駐日美軍的軍火、用火焰瓶襲擊美軍飛機庫、攔截與美國結盟的日本首相，把炸彈投向美軍目標、警察據點、老牌財閥，炸毀軍國主義標誌、襲擊跨國公司……雖然只要炸彈一響辯護就難上加難，我還是想說：國家、警察、法律可以裁定他們的犯罪；而我們，中國人，難道有權站在共產主義的原則上指責說——他們只有罪惡麼？

“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狼小組”在1971年12月12日，同時爆破了建在熱海的“興亞觀音像”和“殉國七士之碑”。

“興亞觀音像”是由指揮佔領南京戰役和南京大屠殺的陸軍大將松井石根建立的，目的是為了安撫慘遭屠戮的中國人的怨念、祈禱日華的融合一體、意在以一句佛號，抹消南京的罪行。

“殉國七士之碑”則是東條英機、松井石根、土肥原賢二、廣田弘毅、阪垣征四郎、木村兵太郎、武藤章七名A級戰犯的“墓碑”。

他們是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判處絞刑的七名A級戰犯（中國慣說甲級戰犯）。七人分兩批被處絞刑之後，七具遺骸被火化。佔領軍當局先宣佈骨灰已撒入太平洋，但又在1955年交還了號稱七戰犯遺骨的白木箱。據說，除廣田弘毅家拒絕認領外，其餘幾家都取回了遺骨。

但是另有一個說法在散佈：據說七名A級戰犯被處刑的時候，部分遺骨已被人從火葬場盜出，後日被右翼分子秘密安葬。這就是右翼的聖地、熱海的“殉國七士墓”。

日美舊金山和約簽字後，日本吉田內閣需要這一類宣傳品。於是，首相吉田茂專為此碑揮毫，“殉國七士之碑”從茲公開面世，成了一處緬懷日本軍國主義的名勝。

— 轟然一聲鉅響，這座碑，連同南京大屠殺後保佑“興亞”的觀音菩薩像，都被“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狼小組”，被所謂極左派學生之“狼”，兩處一塊點火，一炮同時炸飛了！

他們的“恐怖”活動，還帶有相當的學術味兒。

1972年10月23日，“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狼小組”同時炸掉了北海道大學文學部、以及旭川市常盤公園裡的雕塑“風雪之群像”。

原因是：他們認為，“北大”從它最初設立至今，一貫都是對阿伊努原住民進行侵略殖民的一線骨幹養成所。其中所謂北方文化研究設施，不過是侵略阿伊努人的意識形態基地，也是掠奪阿伊努文化遺產的據點。“風雪之群像”，正是一個“日帝”殖民主義者對阿伊努征服戰爭結束、日本對阿伊努人完成了吞併同化的紀念碑。

1968年是明治政府設置北海道開拓使的一百週年。“狼”小組認為，殖民者宣揚“開道百年紀念”，乃是把對阿伊努人的殖民戰爭正當化、把歸併和同化阿伊努人的意識形態正當化的行為。建於各地的紀念碑無非是宣揚這一意識形態和既成事實的手段，“風雪之群像”即其中之一。

旭川市常盤公園裡的、由雕刻家本鄉薪創作的“風雪之群像”，是一個阿伊努人原住民的老者，正給四個男女殖民者指路的造型。“狼”評論說：

日本殖民者全都是站著的立像，阿伊努長老卻是坐在樹樁上。這個構圖，明顯是把日帝、道廳（北海道政府）、日本殖民者進行的對阿伊努土地的侵略正當化，宣揚阿伊努人對日本的屈服乃屬當然，並且露骨地表示阿伊努人低日本人一頭——這是一座侮辱性的雕塑。……面對這種阿伊努土地的征服已經完成的“既成事實化”，阿伊努人並未沉默。圍繞北方文化施設中最主要的、收奪阿伊努文化遺產問題（對阿伊努墓葬的盜掘等），阿伊努的抗議正在興起。包括對這座“風雪之群像”，阿伊努人也

發動了阻止建造的反日鬥爭。

“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狼小組”還有一件“恐怖行為”涉及民族問題和殖民主義。日本為1910年以來在朝鮮的殖民統治中死去的、日本無名殖民者和侵略者的約五千柱遺骨，於1965年在韓國首爾附近建設了一座合祀臺。韓國人自合祀臺立案就憤怒反對、建成後更以汽油焚燒、破壞臺座碑面、發表抗議聲明等手段反對。不得已，1971年日本政府把這五千柱遺骨運回日本，安置於總持寺的納骨堂。

“狼小組”認為：這一行為，是把“日帝”對朝鮮的侵略和殖民地統治正當化、是把日本殖民者和侵略者的“反革命罪行”一筆勾銷。於是第二年（1972）4月6日，他們炸掉了位於橫濱的曹洞宗總持寺常照殿，即納骨堂。

“東亞反日武裝戰線”的群狼幹下的這些事，早被貼上了“恐怖主義”的標籤。但有誰能根據一種道德原理，判決這些行為是“罪惡”呢？

不，我想敘述的，還不是他們。

我只想一筆把相關舊賬勾勒一過，只想快刀亂麻斬斷粘連，只想讓我的讀者和我一起，快快跳出日本國外。

放棄這個話題——難道不是很容易麼？為什麼還不快些隱蔽，為什麼還放縱衝動呢？但是我不能捨棄。早在1983年，我初次在東京遭逢了他們的時候就明白：我不能放棄。不能只為淺間山莊那夥人做的事，就輕易抹消真摯的日本左翼運動。

我不能背叛也不想掩飾我的感情。

我懷著希望，邀請讀者一道觀察——那些叫做“阿拉伯赤軍”的年輕人。

為什麼你如此頑固？

我說：“只緣妖霧又重來”。我這樣做，只是由於今天，世上不單正在硝煙滾滾地進行著一場大規模的十字軍戰爭；而且還

正鏗而不捨地推行著一場解構革命的工程。

何止小小的日本赤軍，被人百般咒罵的，首先是毛澤東和中國革命。這場咒罵，終一個兩個世紀不會終止。因為這工程是資本主義、殖民主義、帝國主義的千年大計，是它們的深謀大略。

寫著這篇散文的時候（2007），新的一批誣衊中國革命和毛澤東的書，正在全球包裝火爆上市。說慌者宣稱在發掘“真實”，就像兇手扮演著死者。那麼殘剩的我們的聲音，就還是有益的。因為剔除和甄別，找出腳踏偉大意義的一部分歷史，此刻更顯出緊迫和重要。否則，若是只剩下了右派的叫囂和侏儒的哲學，世界該多麼寂寞！

人會說，研究歷史到了如此地步真是可悲。

我卻說，研究歷史到了如此火候，就有了局外人的殘忍和虛偽。

我想敘述的，是發生在日本國外的一段故事。不是完整的故事，只是一些散亂的信息。關於一支走過與他們的國內盟友完全不同道路的、“阿拉伯赤軍”的足跡，以及他們的一個女兒的消息。

（五）

23年前，1971年2月28日、被同伴選為赤軍派中央委員的女大學生重信房子，從羽田乘飛機前往貝魯特，朋友和家人到機場為她送行。

當時已變身為游擊隊的左派學生理論，是“世界革命同時論”。毛澤東早期的井岡山、西班牙內戰時的國際縱隊，都給他們方向的指引。苦於沒有根據地的他們，甚至向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派遣聯絡員，想直接與共產黨國家結盟。派往古巴的代表已經出發，只是沒能見到卡斯特羅。

巴勒斯坦，這個響亮的名字和20世紀70年代世界正義的指針，給迷茫的他們指出了一條路。

重信房子懷著一個朦朧的目標，踏上了她的人生狹路。

她和京都大學工科學生奧平剛士做了結婚登記。這樣她就能用寫著夫姓奧平的護照出國。此時奧平剛士已先她一步，踏上了中東的土地。

他們投奔的，是以貝魯特為據點活動的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陣線（PFLP）。

當日本國內發生了殘殺戰友事件時，他們受到了極大刺激。在重信房子的回憶錄，以及岡本公三審訊記錄中，都記載了他們憤怒地向國內赤軍派宣佈“訣別”、決心“率直地改正錯誤”、在巴勒斯坦走出一條新路的心情。

必須強調：這個起點，乃是阿拉伯赤軍的本質。

這一訣別的意義在當時或許還不清晰，但唯因這一次分道揚鑣，使他們的行為和命運脫離了日本國內的是非，而與巴勒斯坦的解放繫在了一起。

他們以此一步，贏得了一席有爭議的歷史地位。無疑爭議會繼續很久，但隨著媒體帝國主義謊言體系的破敗、和人類良知的起義爆發，日本的這一支阿拉伯赤軍，將會贏得歷史的尊敬。

這是後話。

當時，巴勒斯坦人的抵抗組織，被以色列趕出了巴勒斯坦。他們為了生存和祖國，在黎巴嫩的難民營堅持武裝鬥爭——這就是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抵抗運動被“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”稱為恐怖主義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決支持“巴勒斯坦人民的正義鬥爭”的時代。

在那個時刻，日本學生萬里來投，一支象徵性的“阿拉伯赤軍”，在巴勒斯坦人民的懷抱裡誕生了。

這件事意味著什麼？其中的意義何在？

結論已經在很久之前、還將在很久之後出現。

從1972年冬天開始，日本國內開始流傳重信房子的一篇文章，

題目叫做〈給戰鬥的你 — 自阿拉伯的邀請信〉：

世界的鬥爭，已經徐徐化爲一體。只要你拿著一張單程票走出來，那麼我們就會在歐洲、美洲、或者亞洲相遇。不管在哪裡，朋友的天線，會發現陌生的你爲了鬥爭，正漸漸地靠近我們。依仗戰鬥世界夥伴們的世界聯繫，在你出國後一個月左右，阿拉伯赤軍會知道你的存在。

來吧，只手提著行裝，走向未知的城鎮，和我們一起開始戰鬥吧！在你一邊勞動一面學習革命、等待機會的期間，夥伴們會送去戰鬥的邀請。大概在一年裡，奔向哪兒都很簡單，無錢旅行，會檢驗你的革命……

沒錢就沒法子在國外住 — 這是帝國主義心懷鬼胎的造謠。只要單程票和些許費用就足夠了。……有亞洲人，也有歐洲和非洲人，就像從東京到大阪、從大阪到其它城市一樣，世界在展開著胸懷。

事情原本是簡單的。

等著你的到達，爲了握手 —

1972年5月30日，日本刀從左邊出鞘了。

三名日本的“阿拉伯赤軍”，從羅馬機場登上法航客機，抵達了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的里達國際機場。晚十點左右，他們出示了疫苗注射證明書，辦好了入國手續，走進了候機大廳。三個人進入廁所，把偽造的護照撕毀並用水沖掉。然後回到大廳，從寄存行李中取出了衝鋒槍和手榴彈。震驚世界的里達國際機場襲擊開始了。在激烈的槍戰中，一共死傷達98人之多，其中死亡26人，機場一片血光狼藉。

— 但關於事件的細節，有不同的版本：

a, 一般這個事件被稱爲“亂射”事件。官方發表的消息說，這是一次無區別（無差別）的亂射殺戮、是目標對準候機廳乘客的野蠻的恐怖行爲；另一說則是，事情發生後，以色列軍警立即

開槍還擊，死傷的人是在雙方對射中成為犧牲的。

唯一生存者岡本公三的發言是：那並非一次無差別亂射事件。他們的目標，是襲擊機場的管制塔。

b，在槍戰之後，三人中，奧平用手榴彈自爆，安田用身體蓋住滾落的手榴彈被炸死。岡本公三衝出海關闖入機場裡側，用衝鋒槍向以色列飛機掃射、並向停著的飛機投擲了手榴彈。最後他企圖自爆殺身，但手榴彈故障未炸，再向跑道衝去時被抓住。

以色列官方發表說：奧平剛士和安田安之兩人乃是被以色列軍警擊斃；岡本公三並未企圖自殺，也是被以色列軍警活捉。

岡本公三的法庭證言則說：安田投擲的手榴彈撞在牆上，落在了近前。為了不使一般乘客被捲入，安田撲在手榴彈上，被炸身亡。重信房子的女兒最近著書，也支持這一說法。¹

沒有參加行動的另一名原奇襲隊員檜森孝雄，在 30 年之後，即 2002 年 3 月 30 日巴勒斯坦“土地日”當天，於東京日比穀公園燒身自殺，辭世於 54 歲。他留下的遺稿（《水平線の向こうに》、風塵社）仔細講述了當年的襲擊計劃：阿拉伯赤軍計劃攻擊的目標，確是機場管制塔。

— 甚至，由於擔心在作戰中會導致機場乘客的傷亡，還有一名參加者山田修曾經始終反對襲擊管制塔。不久在游泳訓練中，山田溺水而死。或許這不是一個事故，而是一個內心苦鬥的結果。決意參加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裝奇襲、又不能接受襲擊機場的方案 — 在內心折磨和自我表白的撕扯盡頭，人選擇了自殺亦未可知。檜森孝雄正是為護送山田遺骨回日本，才未能參加行動。

最近（2007 年），原阿拉伯赤軍成員、電影導演足立正生拍攝了一部電影《幽閉者》，半似荒唐半是實錄地描寫了這個震撼中東的事件。

¹ 重信 Mei：《秘密 — バレステイナから桜の國》，講談社 2005 年，第 54 頁。

這部古怪片子看似不經意地，留下一個細節：

兩個襲擊者已經犧牲。主人公抓出手榴彈、抱著它伏在地上——這個姿勢有什麼含義麼？

影片手法怪異，讓人難猜本意。

細節已很難追究。

只是，從針對細節的攻防中，能感到這一事件怎樣地受到重視；能發覺包括細節在內，這是多麼敏感的話題。

三個自殺攻擊者都是大學生。

奧平剛士，1945年7月生於山口縣下關。父親是京都大學農學部的知識分子，小三歲的弟弟純三也是赤軍成員。奧平是一個優等生，學習成績經常保持前十名。1964年考入京都大學工學部，同時參加“底層問題研究會”，在京都的貧民區開展服務活動。他在全共鬥運動中嶄露頭角，由於演說形象英俊，據說大受女生們誇讚。1971年飛抵貝魯特。約一年後，在特拉維夫機場事件中，以手榴彈自殺身亡。

奧平寄給父母的絕筆信如下：

久疏音訊了！現在正在羅馬寫著。也許這是最後一封信了。雖然出國後就定然不會再有生還，但是，不可思議地活至如今、和很多人相遇、懂得了很多事情、而且，走向最初思考的路——幾遍想過，仍覺得都是值得感激的事。

讓我隨心所欲、任性一場，無致禮的言詞可表。……

待工作了結之後，再回到您們二位身旁。

祝健康。再見 剛士

— 護身符小心藏著呢，和死去哥哥的照片一起。

安田安之，生於三重縣。性格開朗，學習優秀，高中就讀於名校四日市高校，三年級數學考試全縣（相當中國的省）頭名。父親是高手木匠，夢想兒子能成為一流建築師。所以他考入京都

大學工學部，主修建築。68年京大學運時，他以無組織活動家的方式，積極參與。後來心醉於游擊隊思想，並和奧平剛士交往密切。1971年9月，對父母託言“為了學習建築想到歐洲一轉”，要來路費25萬日元。母親擔心海外物價高，偷偷地又塞給他15萬，他對母親說：“謝謝，我會珍惜。”

父母看見兒子的容顏，是在特拉維夫事件後，政府在全日本公佈照片、尋人認領的時候。據說三個人為隱藏身份，採用了《刺客列傳》中聶政的幹法，破壞面容。但後來以色列軍警從廁所裡找出了粉碎的假護照碎片，復原了安田的照片並送交日本。

公佈那天，據說全日本有十幾個父母都聲言“和我們家的孩子很像”，引起一陣騷亂。安田享年26歲。

電影《幽閉者》裡，岡本公三被俘前的細節，或許也藏有什麼意味：槍擊已經結束，主人公掏出手榴彈。他緊緊抱著，咬牙閉眼，趴在地上。這個鏡頭暗示著毀容？暗示不傷及一般乘客？

鏡頭裡，手榴彈被掏出一瞬，引爆環脫落了，它在地板上一跳，不見了。

第三名，是唯一活下來的岡本公三。

岡本公三，1947年生。鹿兒島大學農學部學生，父親是小學校長。那時，受到法國新浪潮電影領袖戈達爾用電影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啟發，赤軍成員、電影導演若松孝二和足立正生在1971年拍攝了一部記錄片《赤軍·PFLP世界戰爭宣言》，介紹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陣線（PFLP）。這部電影在鹿兒島上演時，岡本公三曾參與協助。他於淺間山莊事件結束的次日、1971年2月29日出國，並隨即加入了“阿拉伯赤軍”的行列。

主人公被俘後，受到了殘忍的拷打，尤其受到藥物注射。據電影導演足立正生以《幽閉者》進行的揭露——他被關進一個鐵籠，被特意製造的噪聲、滴水、飢渴、困倦輪番折磨。軍警在他頭上便溺，每番折磨完畢就把粗大的針頭插入後頸，注射進不知

名的藥物。他發狂地喊叫：殺了我！讓我死！但他無法死，只能忍受超絕常人想像的折磨、忍受摧毀他肉體與大腦的注射。

日本政府為了特拉維夫機場事件，曾派遣了陳謝特使前赴以色列，把佐藤首相的親筆信轉交給以色列總理梅耶。在日本，岡本的父親則聲色俱厲：“判我兒子死刑吧！”

以色列軍事法庭最終判岡本公三終身監禁。

巴勒斯坦人竭盡全力營救他。每一次旨在釋放被捕戰士的行動、包括著名的慕尼黑奧林匹克村襲擊事件，都把釋放岡本公三列入交換人質的名單，而且從不在這個立場讓步。1985年5月20日，在以色列監獄裡坐牢的岡本公三，在巴勒斯坦解放陣線總司令部與以色列的俘虜交換中，獲得了釋放。他終於熬到了這一天，回到貝魯特和“阿拉伯赤軍”的夥伴之中。同時，日本政府也開始了對他的國際指名通緝。

在漫長的監禁中，岡本的精神已經疲弊。非人的折磨，摧殘了肉體，他成了一個癡呆和衰老的病人。

特拉維夫機場事件發生的當夜，巴解陣線（PFLP）宣佈對事件負責。

阿拉伯人宣佈：這次事件，是為了反擊和報復以色列殺害兩名巴勒斯坦游擊隊員的行為、由PFLP組織的突擊隊實行的一次奇襲。因此，事件的硝煙尚未落盡，岡本和他的兩名戰友，已經被阿拉伯人民視為英雄。尤其岡本公三，在阿拉伯人中被稱作“阿拉伯之星”，無人不知“Couzo”（コーゾー，公三）。

日本的赤軍，在阿拉伯受到了承認。

這是一個民族的承認麼？——因為審判中岡本曾宣言：“我們三人，死後將成為東方的三顆星。”

1997年2月，日本政府向黎巴嫩派出了特使，要求引渡國際通緝中的岡本公三等五名日本赤軍。但是貝魯特和阿拉伯人民掀起了鉅大的抗議浪潮，僅有四百萬人口的黎巴嫩有二百多名律師

挺身而出，志願為岡本辯護。緊接著，在 1999 年 5 月 30 日里達機場烈士犧牲紀念日，黎巴嫩年輕人們湧向貝魯特沙迪拉地區的巴勒斯坦墓地，為奧平剛士和安田安之修建墳塋。

2000 年 3 月，黎巴嫩政府在鉅大的國內壓力下，接受了被阿拉伯人民熱烈擁戴的、岡本公三的政治避難。從此，岡本公三就在貝魯特定居下來，一些來自日本和阿拉伯的年輕人守護著他。

一個呼籲建立援助岡本公三基金的網頁，在 2000 年的夏天這樣寫道：

在黎巴嫩，每年到了 5 月 30 日，人們都去給在里達機場鬥爭中倒下的日本赤軍戰士掃墓，召開集會。在火熱的太陽下，大家割掉雜草，清潔墳墓。

今年的 5.30，岡本公三也給奧平和安田掃墓來了！

所有的參加者，都一人一人地和岡本握手。擁擠著的人們有一點緊張，不敢相信眼前的人就是“Couzo Okamoto”（コースウ・オカモト，岡本公三）。

直接和岡本見過面的黎巴嫩人，都因為緊張而顯得姿勢繃緊。我也重新實感了這位傳說中的岡本公三，是怎樣一位“阿拉伯的英雄”。掃墓結束後，大家朝著難民營往回走，沿途老人們說著“岡本回來了”，都流著眼淚。……

黎巴嫩的年輕人，結成了“岡本公三及其同志的友人會”。他們表示，“不管出了什麼事，也要保護（這些日本人）”，“這是我們的義務”，“日本赤軍是為了我們拿起武器戰鬥的同志”，“雖然我們窮也沒有錢，更沒有地位，但保護他們是理所當然的事”。當我表示感謝時，他們甚至生氣了。連出租車司機都對我說：“他們是為了阿拉伯鬥爭的、我們的同志！……”

有一個故事。

在日本赤軍五個人被逮捕的時候（指 1997 年黎巴嫩政府在國際壓力下逐出日本赤軍，引者註），一下子來了二百多個志願者律師。有一個女律師布沙爾·阿爾·哈麗麗對我講到了這樣一個

話題：“岡本公三對我們意味著什麼”。

她還是高中生的時候，那時以色列的攻擊異常猛烈，因此，總覺得以色列是一個“吞食阿拉伯的怪物”、是“不會崩垮的壓頂大山”。

但是那以後發生了里達鬥爭。這一作戰不是由阿拉伯人、而是由東洋來的日本人幹的。這樣一來，全世界都聽見了巴勒斯坦的呼籲。

她說：“我第一次覺得以色列那麼渺小”。因為那次作戰，她被賦予了勇氣，從那以後決心做一名律師。

在南黎巴嫩聽說了日本赤軍被捕的消息後，她徑直趕到貝魯特，參加了辯護。她就逮捕經過嚴厲地質問總檢察長。在以後的辯護中，她挑起了最深觸及了日本赤軍的政治性的辯論，強調日本赤軍里達鬥爭的意義……

“阿拉伯赤軍”發動的里達機場事件之後五週，1972年7月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進行了報復。以色列特務把炸彈安置在汽車上，殺害了要送侄子上學的巴勒斯坦詩人卡桑·卡納法尼。據山口淑子即李香蘭著《誰也沒寫過的阿拉伯》，參加卡納法尼葬禮的人多達七萬。在李香蘭書中的插圖裡，卡納法尼正在對她滔滔傾訴，背後的牆上，貼著毛澤東和格瓦拉的照片。他是巴解人民陣線的發言人，也是一個熱情澎湃的詩人。

緊接著兩週後，又一個郵件炸彈在卡桑·卡納法尼的繼任者、巴薩姆·阿布·謝里夫的手裡爆炸，奪走了他的一隻眼睛和幾根手指。

人們說，報復的相酬是無休止的。那以後，悲劇不斷循環，而且愈演愈烈。慕尼黑奧林匹克人質事件不久也發生了，緊接著是以色列更大規模的報復。在核武器與石頭塊、導彈與步槍的懸殊對峙中，巴勒斯坦人漸漸被逼到了下風。再隨著十字軍戰爭昇級和媒體的助紂為虐，我從戴著紅領巾的時候就聽慣了的“巴勒斯坦人民的正義鬥爭”，陷入了絕望。

使用電影手段的原赤軍成員足立正生，在他十年一劍的電影“幽閉者”片名上頭，不顧攝製組反對，非要添上一行日文註音：“テロリスト”（terrorist，恐怖主義者）。

據影評家四方田犬彥的詮釋，影片作者在這個單詞標音之上，表達了相當學究的觀點。他說：這一稱呼，這個惡諷，是在布什的戰爭中、專指謂戰爭的敵對方的。在巴勒斯坦沒有這個詞，巴勒斯坦人只使用“游擊隊”一語。影片要描寫的，“是威脅著テロリスト — 戰爭對方的、國家的無限制的暴力。影片以不點其名（因為誰都知道就是它們）的諷刺，揭發了某某和某某某才是世界上最兇惡的恐怖主義者。”

重信房子被捕後，在公審中說：“過去也好，今日也好，我都不是恐怖主義者”。她在2005年10月的法庭最終陳述中說“與巴勒斯坦的解放鬥爭相聯合，至今是我的驕傲。”檢察方求刑無期懲役，但被東京地方法庭否決，重信房子在2006年2月23日被判懲役20年。

檜森孝雄的遺書，以這樣的句子開頭：“無條件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對侵略與屠殺、以及對人種歧視的抵抗。無論和平的或暴力的、無條件地支持為恢復人的尊嚴的抵抗。……”² 遺書的落款是：

在連接著巴勒斯坦的海邊，2002 / 3 / 30 土地日，尤素福·檜森

尚不很清楚他們的宗教歸屬。但他們每人都有一個阿拉伯名字，而且在著作或遺書裡鄭重地使用這些名字稱呼：尤素福·檜森、巴西姆·奧平、薩里哈·安田、瓦利德·山田……他們成為死者後都埋葬在貝魯特的穆斯林墓地裡，石碑上只用阿拉伯文寫著他們的姓名和生卒年月。

這一切，和一切的代價，至少增添了人們對世界的理解。

² 檜森孝雄：《水平線の向こうに》，風塵社2004年，第5~6頁。

日本的阿拉伯赤軍事件，是一次襲擊更是一聲呼喊。哪怕嘶啞難聽，那一次，巴勒斯坦的心聲，是用日語喊出的。世界雖然嚇得一陣哆嗦皺起眉毛，但世界已經不能假裝沒聽見。無數人因為它理解了巴勒斯坦問題，包括穆斯林，包括中國人。它既然由世界另一角的日本人做出，也就成了世界對巴勒斯坦問題認識的、一個深刻的註解。

同樣，固執地要寫這一節的我，也是為著這一點拿起了筆。巴勒斯坦問題並非是人們在電視控制的時代，晚飯時瞟上一眼的佐餐談資；更不是不覺間被誰灌輸的、落後的阿拉伯人的又一條壞消息。巴勒斯坦問題是世界上紛爭的最主要起源；是世界硝煙滾滾的主要原因。一些勇敢的日本青年在 20 世紀 70 年代之初、企圖投身解決的這一頑疾固症，今天已經擴散到全世界，成了不治的癌。

抗議日益右翼化的日本，也是赤軍重提的原因。

20 世紀的革命，是對 50 年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、對五百年的世界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秩序——仅有的、唯一的顛覆。同時，迎對著日本國家的奴役鄰人凌駕亞細亞的百五十年險惡歷史，唯有“阿拉伯赤軍”大反其道、大造其反，放肆地嘲弄了“脫亞入歐”的殖民主義道路。

顧名思義，阿拉伯赤軍是投向阿拉伯、也就是投向亞洲母親懷抱的一群日本兒女。

1972 年，重信房子在貝魯特接受李香蘭採訪時，曾說及一個“日本人不會為別國人去死”的舊意識。

狹隘的民族意識，在一剎那被打碎了。那些年輕人，他們以年輕的生命，從阿拉伯換來了傳奇、榮譽和貴重的好感，回贈給自己的日本民族。我想，日本可以拒絕這一回贈，可以用法律的名目否定他們；但日本必須正視——“阿拉伯赤軍”代表的、“歸亞”的方向。

在這個意義上，鍥而不捨否定革命的工程，是注定徒勞的。因

為控制、壓榨、不公和不平、人追求真理的天性，這一切都會推動思考，使人們重新尊重、甚至重新選擇革命。阿拉伯赤軍以一種日本方式證實了這一可能，其懾人的力量，遠非侏儒與黨棍能否否定。

——回顧他們的實踐和勇氣，我只覺得羞愧無地。在他們的影子下，我唯覺自己的渺小。獨自看那個電影的夜裡，強烈的衝動撞擊著胸膛。在標榜革命和共產主義的中國，不能無人傳達他們的訊息。

責無旁貸，這是我的責任。他們能不怕粉身碎骨，我也不怕老鼠大軍。我不願——連“愛”這個字都不敢說出。我要一吐為快，歌頌瞬間的光榮。我總算寫出了這一篇。這是招致圍剿、毀名丟利的一篇，但這更是我的文學年表上重要的一篇。

我早就分擔了罪惡感的齒咬。在那太激烈、太龐雜、太短暫的歷史中，輝煌和陰暗、罪過和功績，糾纏得難解難分。一切都屬於他們，一切也都屬於我們。

“阿拉伯赤軍”——他們不過用犯規的嗓子喊出了真相、用極端的手段強調了公正。他們衣衫上滿濺的血污，使人忽視了他們捍衛和平的初衷。挺立在一浪浪推來、企圖把革命誣蔑為一種惡魔瘋狂的、40年不休不止的帝國主義宣傳之前，它提供了一個真誠的例子。它告訴了人們革命的合理，革命中人的犧牲、路的狹窄、情感的沉重、種種的不得已。

從樺美智子死亡到重信房子被捕，在厚厚的日本左翼史的案卷中，我想，能忍受住苛刻的歷史審視、能俯瞰侏儒的世論、能使追求正義的人敬服、並成為他人參照的，或許只有“阿拉伯赤軍”這一頁。

這一頁平衡了厚厚的一本。

(六)

那麼，對思想貧窮的我們來說，還有什麼遺產可言呢？

不盡的悲劇一直在說：激進的革命思潮，只能導致非合法、暴力、炸彈，它是一條無望的絕路。所以，抗議和反體制的傾向，是不可取的。

時至如今，已經沒有誰再為革命辯護。已經很久沒有清新的詞彙誕生，刷新這貧乏的話語了。

何況——整個問題還有另外一面。

魯迅講過這種微妙的心理和思路：革命的夥伴派他去暗殺，他不習慣，也不願意。結果，沒有去就回來了。

一個選擇的黑影，悄然但嚴峻地隱現在前。雖然形形色色的行人過客，終其一生，都未曾與這樣的大命題相遇。

魯迅說的是最深的心底話。他最初曾把這種心情向增田涉透露，後來又對許廣平講過：他不喜歡刺殺之類的手段。雖然他一生都為反叛和異端辯護，但他坦白：他不喜歡那樣的方式。

究竟是否存在——以“和平”為手段執行的“正義”呢？和平主義的、非暴力和拒絕流血的道路，它存在麼？究竟為什麼，和平與正義這對孿生的姐妹，卻像是相悖的分歧？

在這樣的思路上苦苦尋索，就會與另一些日本人相遇：比如記者本多勝一，比如影星李香蘭。

1

對中國人來說，或許更雄辯的是李香蘭。

被想像成嗩聲唱著靡靡之音的、滿洲國電影明星李香蘭，怎能和極左派恐怖分子岡本公三、還有重信房子扯到一起呢？

誰敢相信：正是李香蘭，曾經首先推動了日本的良知，在上世紀70年代率先把目光投向巴勒斯坦。

李香蘭（她的日本名字叫山口淑子）在那個時代擔任電視主持人。幾乎與日本的阿拉伯赤軍同時，她意識到巴勒斯坦問題的

嚴重，並進行了對巴勒斯坦的採訪。歸國後，寫了一本《誰也沒寫過的阿拉伯》。最近，她又在自傳《生於李香蘭》中，再次為巴勒斯坦人的苦難、甚至為“阿拉伯赤軍”表示同情和辯護。³

讀著這兩本書，心頭的感動是異樣的。感覺居然和讀著赤軍的史料一樣。這昔日大紅大紫的明星，用娓娓的女性語氣，毫不遲疑地呼應了——站在被殺戮者的一側、推動世界公正的觀點。

《誰也沒寫過的阿拉伯》扉頁上，印著一幀她抱著一個嬰兒的照片。照片說明寫的是：

阿拉伯游擊隊的特拉維夫機場襲擊事件後訪問貝魯特難民營。一個女人塞給我這個嬰兒說：這個孩子送給你了，盼你把他培養成岡本公三一樣的勇士！

後來，她又在自傳《生於李香蘭》的開頭，更詳細地寫到這件事。

在貝魯特的難民營裡，一個老太婆抱著一個男嬰走向她，嘴裡不停地講著聽不懂的阿拉伯語。翻譯遲疑地用英語轉譯著，好不容易才弄懂，原來那阿拉伯老太婆是在說：

這個孩子送給你。帶到日本，讓他受到更好的教育吧。我已經不能回到巴勒斯坦了，但是盼能讓這孩子戰勝以色列，踏上祖國的土地……⁴

那一次，巴解人民陣線的發言人、詩人卡納法尼特別給她留下了親切的印象。卡納法尼甚至給她起了一個阿拉伯語的名字：加米拉（Jamila），這個詞的意思是“美麗”。

李香蘭喜歡也珍視這個名字，所以把它當做自傳第一章第一節的標題。她用這個名字做題目，來紀念不久後就遭以色列暗殺

³ 山口淑子（李香蘭）：《誰も書かなかつたアラブ》，産經新聞社 1974 年；《李香蘭を生きて》，日本經濟新聞社 2004 年。

⁴ 李香蘭：《李香蘭を生きて》第 11 頁。

的、那個優雅的詩人。

當然，李香蘭對巴解人民陣線發言人、詩人卡納法尼最好的追悼，是她在這本明星自傳裡準確傳達的、卡納法尼對巴勒斯坦問題的最基本觀點：

巴勒斯坦人鬥爭，是爲了回到家鄉巴勒斯坦。……

我們的敵人，是猶太復國主義而不是猶太人和猶太教徒。我們解放巴勒斯坦的目的，就是爲了讓阿拉伯人、猶太人、基督徒等過去曾經一直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和睦相處的人們，再次一起生活。……

我們要一個一個地教給孩子們：猶太人不是敵人而是鄰居。⁵

也許用岡本公三的例子，已經不能說服飽受美國式洗腦的朋友們。李香蘭的例子，是否會多一些說服力呢？

其實無論誰都選擇了自己的立場。不管自己是否意識到，人們紛紜的議論，其實只顯露了自己作為人的質地而已。

2

在援越抗美的世界大潮中，《朝日新聞》記者本多勝一在越戰採訪中，提出了“站在被殺戮者一側”的思想。

就像書題的表述，在紛爭殺戮的今天，任何一個打算活得正直的人、任何一個有良心的人，都該有這樣的立場：無論強權霸道如何得勢，無論媒體怎麼散佈謠言，人應該站在被殺戮與被剝奪的、無助和絕望的人們一側，反抗橫行的霸道，支持弱者的抵抗。

不止一個人回顧過初次接觸本多勝一思想時的感受，回顧他們無法忘懷“被殺戮一側的論理”——這言簡意賅的警示，對他們靈魂的衝擊。

⁵ 李香蘭：《誰も書かなかつたアラブ》第168~169頁。

“論理”其實不是理論，它只是貫穿融化在一冊《被殺戮一側的論理》之中，其實並沒有哪一篇專門做思想的闡釋。本多勝一的文章，是一系列行動的組成部分。一個新聞工作者的“取材”只是他的涉及之一。他以關心世界為己任，他也有做如此關心的能力：從殖民主義在美洲的屠殺，到日本軍隊在南京的屠殺，全球範圍內，上下五百年，他清算不平、聲援弱者、毫無妥協、從不惜身。

本多勝一那驅使龐大知識、排除一切曖昧、直逼問題要害的氣概和文筆，擁有一種掃蕩的氣勢。默默讀著，我見識了日本的骨氣。

何止越南，包括對南京大屠殺，他的鮮明，他的雄辯，那些激烈的句子，那些嚴肅的考據，在龐大的文章之海之中塑造了作者。他是一個誠實的人，主動救援苦難的人，從不轉向的人。只是瀏覽了目錄，瞭望了他的文章構成，就使我感到了敬重和信任。

不盡的惡意，被他激起——木秀於林，風必摧之。若想瞭解本多勝一的全面，幾乎等於面對整個現代史。30 數卷的全集中，越南戰爭、柬埔寨殘殺、美利堅合“州”國的霸權、南京大屠殺、原住民問題、貧鈾彈、環境破壞……等等，覆蓋龐大，人所不能。他的著述早已超越了新聞記者的職業，他不僅為自己、更為日本的思想界贏得了名譽。

我讀得較細的，除了最早的政論集《被殺戮一側的論理》之外，只有他的《南京大屠殺》。這是最使他招致惡毒咒罵的一本著作。但對中國讀者來說，作者遭受的咒罵愈惡毒、愈說明他勇敢地衝決了禁錮日本人思想的民族主義，站到了當年被屠戮、今日被歧視的中國人一側。

《南京大屠殺》是本多勝一給中國的最好自我介紹，也是他龐大著作的基本註釋。對南京的態度，證實著對越南的態度。對南京真相揭露的雄辯，支持著對伊拉克真相之揭露的可信。

在日本的知識分子中，尤其是他，擺脫了曖昧的日本病。他攻擊體制豢養下群儒的言動，是由於對日本思想平庸的憤慨——

正如他自己所表白，是由於對日本的熱愛。

前年（2006）在東京，由結識多年的朋友、原《朝日新聞》北京支局長田所竹彦領著，我們去拜訪了這位前新聞記者。

我對他說：

那是越南戰爭剛結束不久的時候，我還是個年輕人，一個從小在北京長大的日本朋友，第一次對我提到了你的名字、和《被殺戮一側的論理》。這個書名給了我特別的印像，我一直沒有忘掉這個書名。

而今天又像越南戰爭時一樣。美國又掀起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新高潮。而且它打出的是十字軍的舊旗，把殺戮強加給穆斯林世界。然而今天很難看到新聞記者、作家、知識分子、藝術家，尤其是青年，站在“被殺戮者的一側”，譴責歪曲的時代。甚至正相反：從共產黨到紅衛兵，侵略者募集了鉅大的啦啦隊。在北京，只因對美國侵略的態度不同，數十年的舊友便反目交惡。作為本多勝一，你怎麼看這一切呢？

他說：……我對現在的記者是絕望的。越南戰爭期間，記者很活躍，都是個人行動。那時流行做實錄，很有意思。而今天，比起正義，人們更關心的是個人的利益。電視的影響很大，新聞記者再也不去冒險，再也不親身去“現場”。他們只是利用網絡，只利用第二手資料。而人們，大家都習慣於——似乎是真相的新聞。

本多繼續說：老年之後，我在編輯《週刊金曜日》，就是想給讀者盡力提供“現場的感覺”。2002年我去伊拉克，調查第一次海灣戰爭中美軍使用貧鈾彈的問題。在廢墟和殘骸上，放射線很強。從那次調查以後，身體就衰弱了。調查之後僅半年，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就爆發了……

我提了最想向他確認的問題：

“我一直想，美國不是只要打一個伊拉克。它是要發動一場征服和控制世界的大戰爭。”

“已經開始了。”他的回答很簡單。

我聽得難過，又問：這樣的形勢會怎麼發展呢？

——會越來越嚴重。他在回答中分析了美國。因為，從大的視野看，美國是一個唯有在戰爭中才能存在下去的國家。它雖然只有二百年歷史，卻從未停止過侵略。從華盛頓的時代開始，先是針對美洲；進入20世紀前，已經瞄準日本。此外還有夏威夷、菲律賓。接著是越南，直至伊拉克。即便伊拉克戰爭結束，它也一定還要發動別的戰爭。它的軌跡是連續的。

我聽著想：關於這一點，有幾個中國教授會同意呢。

他說：日本歷史上沒有革命，所以很難期待。日本人的基因，百分之90是順從的，不會幹革命。這也是讓人絕望的原因。日本人的基因，很像羊。

“那美國佬的基因，一定像狼啦！或者像野豬！……”我忍不住，開始嘻笑胡說。“中國人呢？像——”

聽著我的發泄，本多勝一微微一笑。

注視著他，我想，包括中國革命和日本精神，都沒有在教育方面戰勝美國。今天時代的大潮已經退盡。異議和抵抗，正被恐怖地孤立。兇惡的帝國主義在小人歡奔下流自娛的喧囂中，一路硝煙，攻城略地。

有人說：一場越南戰爭留下的最重要遺產，也許就是本多勝一的這句話：“被殺戮一側的論理”。

我想，這麼說是有道理的。人最應有的品質，年輕人應有的品質，知識分子應有的品質，都凝縮在這一句之中。也許沒有另一句話，比它更能揭示從越南戰爭到野蠻今日，這社會和人的緊切需要。

我想得到一本《被殺戮一側的論理》做紀念。

我說，我想在今天讀這本書，會有新鮮的感受。他卻送給我全集的另一本，《南京大屠殺》。

讀後我才知道，這本書是本多勝一鄭重送給中國的禮物，哪

怕中國人多不知道——他因這部著作，被右翼分子咬牙切齒欲食其肉，也招致了不少自由君子的反感。

如果他沒有遭受圍剿，如果不是連我的一些日本舊友都對他攻訐，也許我不會這樣認識本多勝一。當不安的新世紀肇始，無論中國，或是日本，並沒有多少人——為“他人的苦難”不能安寧。大家都在享受自己的小康，不在乎世界的一隅，殺戮正以堂皇的名目實行。

此刻我想引用一段。

但哪怕薄薄一冊《被殺戮一側的論理》，內容也涉及廣大的領域：屠殺與歧視、越南、美國的戰爭軌跡、原子彈的毀滅、珍珠港、黑人運動、阿伊努原住民、質疑人類學、探險的追究、日本的作家、評諾貝爾獎、中國、靖國神社……等等，還更有與一個宣佈“我愛星條旗”的美國牧師就越南索米村屠殺事件展開的、往來四五回合的激烈論戰。

儘管不易選擇，我還是移譯一段：

“戰爭嘛，本來就是那樣！”

現在對正遭殺戮的越南民族能這般說話，如觀戰棋局，對美國的戰爭推進者而言最佳不過。……

某來信讀者、一個曾是日軍官佐的公務員，對索米事件這樣寫道：

“十人裡，有兩個游擊隊其他八個護著他們，能以危險為由後退麼？我是哪怕殺十個也要完成任務。”

——能讓如此發想隨便冒頭的日本，對數百年、否，對千年來一直蒙受侵略的越南朝鮮，是何等可怕的國家！

正因日本是這麼一個國家，才愈是不能擁戴美國。因為若擁護了美國，就會犯下比美國更甚的侵略罪行。……

我們日本人要有——偏是越南朝鮮，才非要擁護的立場。若不這樣，再說到廣島長崎，美國人這麼一說日本人就沒辦法了：

“原爆嘛，本來就是那樣！”⁶

確實，非暴力的原則，愈來愈成為人們的願望。在今天，具備說服力的不是阿拉伯赤軍的犧牲，而是本多勝一的說理。

……成城學園站前的咖啡館裡，鄰座的主婦們吵嚷得震耳欲聾。我竭力地豎耳分辨他低沉的嗓音，一瞬間想到一個古怪的話題：知識分子的責任。

如今，在中國和日本，兩國之中還有多少知識分子肯捨身向前，為那些被佔領家園、殺戮性命、剝奪話語的人，辯護他們的道理呢？

我沒有問。我知道，這個問題該提給自己。

3

— 圈子雖然繞得太大，但已經繞回了起點。

其中交叉著那麼多人的軌跡：樺美智子、重信房子、岡本公三、李香蘭、本多勝一。此刻 — 那個時代的兒女，有名和無名的、逝去的和生存的，都從往事中、從書籍中，默默地起身，向著我們走來。

比起不少諾貝爾獎和媒體炮製的人物，他們更真實、更具備意義。而且，也更有人情味。他們是一些無形的碑石，埋在路口，當殘暴橫行時，當謊言肆虐時，他們會顯現出來，擋住強暴，給和平以救援。

在這血肉之軀圍起的圈子中央，矗立著一面寫著“和平”的旗幟。

不曾有過一個國家如日本。它有一部美國佔領軍替它制定的憲法，但正是美國，今天竭力慫恿它違憲、修憲、毀棄這部憲法。

而日本民衆的一切奮爭，不論是過激的還是理性的、不論是群眾的運動或是孤膽的努力，都是對憲法九條的防衛。日本憲法

⁶ 本多勝一：《殺される側の倫理》，朝日新聞社 1982，第 72~73 頁。

因染上的淋漓鮮血，完成了它的奇異質變，如礦石在烈火中煉成了金。它早已蛻盡了底色，蕩滌了美國佔領軍的塗抹，變成了一種世界的追求。

哪怕有一天九條離開憲法，日本已不可能後退到昔日。未來日本民族的體質中，將會活著一個靈魂。它是由那些著名和無名的戰士以鮮血澆灌的、新的民族之魂。

它像墓地中的一座紀念碑，像雨林簇擁的一株千年松。這是日本曾有過的最激動人心的歷史形象，是亞洲和世界高舉雙手歡呼的日本象徵。染血的“和平”在殘破的旗子上呼呼作響。九條或許會成為歷史，但是象徵將會永存。

它已經是新的日本文明的基礎。

我頭一次感到了它的份量。九條，和平，回想起那麼多次長期居留日本，我從未仔細思索過它。

如今，在直面著新的帝國主義進攻的今日，我終於感到它如一股新鮮的血液，也流進了我的身體。我不僅能向日本、也能向美國和一切強國、向我的祖國尖銳地提問：

在中國，會產生這樣的理念麼？中國人會做出絕對的不戰允諾麼？會用憲法約束對和平的守衛麼？

我們敢於挑戰傲慢的大中華思想、並以法律禁止未來可能的、對弱小民族和國家的威脅麼？

我緊張而興奮。

所以人們常說，和平憲法早超越了日本，它已是進步人類的一致願望。圍繞九條的滄桑已提示人類：社會的最好契約，必須是一切國家都盟誓允諾、放棄戰爭這貌似神聖的“主權”。

事不關己的時代就要結束，歷史已經強求中國思考。

是的，在日本的啟發下，我們也開始摸索——讓自己的祖國、尤其當她錢包鼓滿船堅炮利之後，也做徹底的不戰承諾。讓我們在修改了百年仍是草案的憲法上，在它莊嚴的共和國條款中，也

表達如上的精神。

它會刺傷大中華的虛榮麼？它會破了泱泱大國的面子嗎？不，那才是民族振興的真正象徵，那才是大國的風範景象。

無論歷史將怎樣演出，早晚中國要走到這一關口。是的，如果我們能推動自己的祖國抵達那樣的繁榮，就連逝去的日本同志，也將得到安慰。

這不是癡人說夢。這是令人陶醉的理想。

(七)

讓我找到一個焦點，結束最後的段落。

— 阿拉伯赤軍的負責人重信房子在阿拉伯生活了二十八、九年。她與一名巴勒斯坦戰士之間，生下了一個女兒。

一個女兒！

日本女性和阿拉伯人的女兒！我想著只覺光芒眩目。

是的，他們不僅留下了足跡，還留下了女兒。赤軍的女兒，這個朦朧的形象，使我浮想翩翩。她似乎能淡化一切沉重，包括血腥和歧路，如一個天使或幻夢。也許，這夢一般的女兒，能成為我沉重話題的結尾？

聽見我多次重複，不斷唸叨赤軍的女兒，有人說，既然你有這麼大的心思，可以設法讓你見到重信 Mei。

我說不，你錯了。我不需要見她本人。因為我更願這“赤軍的女兒”，繼續留在想像裡，成為一個神秘的憧憬。

2001年4月3日、重信房子的女兒、28歲的重信 Mei (メイ，命) 初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，應了一個算命的阿拉伯老奶奶給她的預言：在那一年裡，人生會有大變。

既然已經被捕，也就結束了潛伏的狀態。母親決心讓女兒恢復國籍。她在拘留所寫了一本上交日本法務局的申訴書，這就是

題為《在蘋果樹下決定生下你》的重信房子自述。

經過了複雜的手續和 DNA 鑒定，從出生以來 28 年無國籍、隱姓埋名、扮做一個黎巴嫩女孩長大的“命”，終於恢復了日本國籍。於是，恐怖組織的領袖母親雖在坐牢，潛行異國的女兒卻堂堂正正、合法地回到了日本社會。

一個從小就在貝魯特的巴勒斯坦難民營長大的女孩、一個能講阿拉伯語、日語、英語、法語四種語言的天才、一個貝魯特美國大學碩士和日本同志社大學的博士、一個顯然對世界有話要說的、潛在的巴勒斯坦人民和日本左翼運動的年輕漂亮的女發言人——沉著地走進日本，露出迷人的微笑。

重信 Mei 名字的漢字，是“命”（メイ，Mei）。母親解釋說，是為了紀念革命、犧牲同志的生命、危險中的命。但她一般不用漢字而用日文メイ表示名字，為閱讀方便，我採用“重信 Mei”的寫法。

我不願讓她具象化，沒去刻意尋找她的消息。我只仔細讀了一本她寫的自傳，《秘密——從巴勒斯坦到櫻花之國》，以及一篇她與人討論一部庫爾德題材電影的文章。

由於生得漂亮，打開電腦，甚至能找到她的粉絲網。

她的政治色彩如何？

謙和迴避的日本人很少議論。無疑她不會重走母親的狹路。世界已展開在她的面前，道路唯有她自己才能挑選。好像她也正表演著這謎語般的角色，熟練而神秘。

當然，儘管她還沒有拿出本色，重信 Mei 已是巴勒斯坦問題的權威解說者。到處都有人請她去舉辦講座，做巴勒斯坦專題的講演。

母親在沒有桌子的監獄裡寫下的回憶錄，記載了她的降生。為重信房子接生的貝魯特一家醫院，在母女出院的時候，堅決拒絕收費。醫生激動地說：

要道謝的是我們。我們一直為只能說一句謝謝，感到心裡難受。不管怎樣請別付什麼錢！……我也是巴勒斯坦人。光榮的為

我們民族鬥爭的日本人，能來我的醫院讓我高興。……祝賀你順利出產，然後再感謝你；為巴勒斯坦，為阿拉伯。而且我相信還應該說，為日本人民。願真主給你女兒保護，她是我們醫院的驕傲。起名字了嗎？（重信房子回答：名叫命，Mei，阿拉伯語的Hayāt，哈婭苔）祝賀你，Mei·哈婭苔！平安賜予你，真主保佑你！⁷

誰是赤軍的女兒？

Mei-Hayāt？

我只知道，一代新人的她們已經誕生。世界已轉交到了她們的手上。她們是健康的、多民族結合的產物，天生就否決了種族主義。她們自孩提時代就失去了家園，所以她們的夢想，只有家園。她們最熱愛的，唯有和平。

誰是赤軍的女兒？

Mei-Hayāt？

我只知道，一次新的革命已經啟動。也許和過去的革命有了鉅大的差異，也許暴力和流血已被擯除。但是，捍衛和平的終極目標不會變，援救弱者的衝動不會變、站在被殺戮者一側的正義不會變。

赤軍的女兒。

美好的夢想。

— 她將繼承我們的靈魂、刷新我們的時代、跨越我們的悲劇。
她將在新的世紀，迎來世界的新生。

⁷ 重信房子：《りんご木の下で君を生もうと決めた》，幻冬舎 2001 年，第 136~137 頁。